

引用格式:滕祥河,文传浩.不同移民扶持政策的扶志效应差异:基于三峡库区水电工程移民的实证[J].资源科学,2022,44(7):1463-1475. [Teng X H, Wen C H. Aspiration inspir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supportive policies 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settler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7): 1463-1475.] DOI: 10.18402/resci.2022.07.12

不同移民扶持政策的扶志效应差异 ——基于三峡库区水电工程移民的实证

滕祥河,文传浩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昆明 650091)

摘要:有效激发移民的志向水平是形成自我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本文使用2019年采集的三峡库区水电工程移民调研数据,借助OLS、Shapley和Oaxaca-Blinder分解法考察了扶持政策的扶志效应,并探讨了在不同安置情境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①资金补助型扶持政策与环境改善型扶持政策均能显著提升移民的志向水平,但后者的贡献率大于前者。②资金补助型扶持政策与环境改善型扶持政策的扶志效应因安置模式与安置时长不同而存在差异,资金补助型扶持政策对提升就近安置移民志向水平的作用更大,而环境改善型扶持政策对提升外迁安置移民志向水平的作用更大;且随着搬迁安置时间的推移,资金补助型扶持政策的扶志效应减弱,而环境改善型扶持政策的扶志效应增强。③不考虑扶持政策时,移民与非移民志向水平差异主要源于身份歧视因素;扶持政策介入下移民发展志向水平仍低于非移民,但移民与非移民间的志向水平差异主要源于两群体禀赋上的合理差异。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包括:将扶持政策作为提升移民志向水平的重要抓手,依据移民特征搭配使用不同类型扶持政策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在政策扶持过程中注重缩小移民与非移民的志向发展差距。

关键词:移民;扶持政策;扶志效应;资金补助型政策;环境改善型政策;Shapley分解;Oaxaca-Blinder分解;三峡库区

DOI: 10.18402/resci.2022.07.12

1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刚需驱动,一系列交通运输、城市建设、能源供给与环境保护等国家工程建设相继启动并由此产生了大规模搬迁安置移民。搬迁安置改变了移民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尤其由于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损失以及早期安置补偿条件相对不充分,移民因搬迁出现了致贫和返贫的现象。以水电工程移民为例,改革开放前产生的大部分水库移民处于贫困状态,实行开发性移民政策以来,仍有很大一部分移民未脱贫^[1]。为帮助移民脱贫致富和促进移民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央及地方政府开展了一系

列扶持政策。改革开放前,对移民的安置扶持主要采取了资金补偿政策。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移民扶持政策从传统单纯补偿救济中逐渐解脱出来,在实施资金补助型政策基础上,更加强调对移民安置区的人力资本、自然要素和社会资源的综合开发^[2],探索实施了对口支援、移民产业发展基金、税费减免与免关税等政策。由此形成了既立足于补偿,又着眼于突破制约移民发展的外部环境约束的扶持政策,为解决移民的温饱问题和消除绝对贫困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然而,在消除移民绝对贫困后,移民贫困治理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从现实情况来看,仍有部分

收稿日期:2022-01-18;修订日期:2022-05-22

基金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W8203020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CJY06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95)。

作者简介:滕祥河,男,山东临沂人,师资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移民经济与环境管理。E-mail: 763694332@qq.com

通讯作者:文传浩,男,重庆万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流域可持续发展。E-mail: chhwen1972@163.com

移民发展信心不足,将自身发展完全寄希望于政策支持和他人的帮扶,对公共政策也难以做出积极的响应^[3,4]。相比移民扶贫,提高移民志向水平或抱负水平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移民安稳致富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实际上,志向水平是个体对特定任务的期望和目标^[5],刻画的是个体对未来自我价值实现的主观态度和主观期望^[6]。依此而言,移民的志向水平反映了移民的发展信念和期望,移民志向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移民经济决策和努力水平。那么,扶持政策在实现移民物质扶贫过程中,能否激发移民的发展信心和斗志,引导移民增强主体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不同扶持政策在扶志效应上又有什么差异?当前及今后研究亟需对这些问题做出更为深入和细致的阐释。

基于此,本文重点探讨扶持政策与移民志向水平的关系,并基于2019年采集的三峡库区水电工程移民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值得指出的是,使用该调研数据的主要原因在于:三峡库区水电工程移民的规模较大,搬迁安置持续期较长,移民安置方式多样,且搬迁安置期间移民扶持政策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因而,本文借助该样本数据有利于揭示扶持政策扶志效应的时空异质性,并比较不同类型扶持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贡献在于:一是从扶志效应的视角揭示政府扶持政策的有效性,而且重点区分了资金补助型政策与环境改善型政策两者之间的差异。二是探讨了扶持政策对提升移民发展志向的贡献度,并结合移民安置方式和安置时长,进一步探讨了移民扶持政策扶志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和动态发展趋势。三是对比分析了移民与非移民之间的志向差异及其来源。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2.1 文献综述

从既有研究结果来看,学者对移民扶持政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3个方面:①开展扶持政策的比较分析。主要以世界银行的移民安置政策为参照,集中探讨了国内外移民政策在政策目标、政策影响以及政策的实施和监测等多个方面上的差异^[7]。同时也对不同类型的移民扶持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如宋海朋等^[8]从补偿安置的主体、内容、方式以及资金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水库移民与建设征地农

民补偿安置政策的异同。②总结移民扶持政策变迁。如孙良顺^[9]重点研究了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演进过程,认为政策扶持的内容转向了特色产业培育,扶持资源分配则更关注水库移民贫困人口,与相关惠农政策的统筹衔接和政策关联性越来越强。而且,要保障扶持政策的持续性需要对其进行适应性调整,从主体协作、行为选择、利益整合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10]。③分析扶持政策实施的制约因素与实际效果。一些学者从历史因素、政策认知、政策风险等多个维度梳理了影响移民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性因素^[11-13]。另一些学者则重点评价了扶持政策实施后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结果,部分学者认为政府政策支持并不总是具有“益贫”效果,单独依靠补偿难以克服不同风险冲击以脱离贫困^[14],而且直接经济补助反而可能使得移民产生依赖心理^[15]。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对移民扶持政策展开了有益的探索,但依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其一,缺少分析扶持政策不同模式的差异,尤其缺乏对不同政策扶持模式的政策效果评价。其二,少有文献关注扶持政策的扶志效应。后扶贫时代扶贫治理的一个重要转型就是加快实施“志智双扶”,尤其需要从扶志的层面提升移民发展的内生动力。其三,对扶持政策的评估缺少时空差异的比较,尤其缺少从时间角度探讨扶持政策效应的动态变化。本文拟在这些方面进行拓展分析。

2.2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2.2.1 政策扶持与移民扶志效应

搬迁安置对移民会产生两个相反方向的影响。一方面,移民搬迁会带来社会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和相关利益再分配,能够增强移民发展机会的可得性^[16,17];而且,处于安置地陌生环境中的移民互动、互助频率会更高,这为移民恢复和重建生产生活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搬迁安置不仅会带来移民物质层面上的资产损失,也会给移民带来心理冲击。比如搬迁后不少移民存在着强烈的心理失衡,有一种心理躁动、不稳定的潜在隐患,移民因缺乏归属感对群体外的交往产生忧虑紧张情感^[18]。根据损失厌恶理论,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对称的,损失的痛苦感大于同量收益的快乐感。因而,当搬迁安置对移民的积极影响没

2022年7月

有冲抵消极影响时,移民就容易出现信心不足、志向短浅和安于现状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政府扶持政策的介入有可能改变移民在工程建设中的“边缘”和“附属”状态,并将安置区的发展和移民个体发展结合在一起,促进移民资产的重新累积^[19],切实改善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20],由此对冲搬迁安置的负面影响。

不过,从扶持政策类型来看,资金补助型政策的扶志效应可能弱于环境改善型政策。这是由于搬迁安置所产生的一些生产生活资料的损失无法用货币来衡量,因而要准确地计算支付给移民的补偿费用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很多补偿标准并没有反映市场价值的变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固定的补偿金额与实际需求形成的缺口加大,移民补偿出现不足问题。此外,资金补偿还会导致移民对扶持政策产生依赖,形成“坐、等、靠”的发展惰性思维,甚至政府补贴带来的政策依赖负作用会超出补贴带来的直接好处^[21]。资金补助型政策的缺陷以及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推动了环境改善型政策的创新发展,移民地区发展环境的整体提升为增强移民个体的内生发展动力提供了更加可持续的保障。综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1:政府扶持政策能够提升移民发展志向,而且环境改善型政策的扶志效应要大于资金补助型政策。

2.2.2 安置方式、安置时长情境下扶持政策扶志效应的异质性

移民安置方式是根据移民从事的产业、组织实施方式、补偿形式、居住地点等所采取的具体安置方法和安置形式。从移民原居住地与安置地的距离来看,移民安置方式可分为就近安置和外迁安置^①。其中,就近安置是指发生在原行政区划范围内的近距离安置,其初衷在于通过近距离安置减轻搬迁给移民带来的资产损失,而且这种近距离迁移使得搬迁前后两地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进而为搬迁安置移民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而外迁安置往往要跳出原行政区划,这种远距离外迁安置能够减少移民对原有发展环境的依赖,解决原居住地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的问题,且外迁

安置还会将一个局部社会的各种关系以及文化习俗等构成要素被迫性解体并进行定向性重组。因而,就近安置与外迁安置两种安置方式实质上体现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区别以及对此采取的策略性取舍。自然环境差异对移民的影响往往更直接、更强烈,社会环境差异则比自然环境差异的影响更深远、更持久。因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不同安置模式对移民的影响差异较大,对移民的扶持手段也需要因地制宜。相比近距离安置,远距离安置离开了原有熟悉环境,较之于近距离安置移民面临更大的社会适应难题^[22],在征地、对接和增效上也存在多重难题^[23],由此对移民发展志向产生更大的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相较于就近安置移民,具有短期见效快但长期可能不可持续的资金补助在帮助外迁安置移民适应新社会文化环境和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上作用有限,而在资金补助的基础上改善安置地发展环境,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升移民利用新发展机会的能力,并帮助移民重获缩小与原居民发展差距的希望。

从安置时间来看,不同安置时间能够体现出移民生产生活恢复状态的差异。短期内,移民资产累积能力较弱,越需要依靠政策扶持;相反,随着安置时间的延长,搬迁安置的短期冲击效应减弱,移民生计逐渐恢复,因而对资金补助型政策扶持的依赖减少,而对移民安置区的发展环境依靠程度增加。而且,随着移民安置的经验不断累积,扶持政策逐渐细化和完善,为移民提供了比过去更多的发展项目和发展机会。即使移民没有足够的信心利用这些机会,他们也能在安置地新环境中切身感受到这种发展机会;且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积极回应新发展机会以努力改善自身生产生活状况^[24],在此新发展背景下的移民志向水平也会相对更高。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2:资金补助型政策对提升近距离安置移民志向水平的作用比远距离安置移民更大;环境改善型政策对提升远距离安置移民志向水平的作用比近距离安置移民更大。

H3:安置时间越长,资金补助型政策的扶志效应越弱,而环境改善型政策的扶志效应越强。

① 本文中的就近安置移民是指重庆市内安置移民,外迁安置移民是指重庆市外安置移民。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数据处理及搬迁移民概况

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三峡库区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先后开展了5次问卷调研。本文数据来自2019年1月12—25日团队开展的第5次三峡库区水电工程移民问卷调查。根据搬迁政策实施情况,此次调研样本区域主要选择了重庆市、江西省和江苏省。从三峡库区移民数量分布上来看,重庆市的三峡库区移民搬迁安置总人数占整个三峡库区总人数的比重超过4/5,是三峡库区移民最主要的安置地;江西省接收三峡库区移民数量居沿江中部省份之首,江苏省是沿海东部地区接收三峡库区移民最多的省份,搬迁移民样本较为丰富。从搬迁安置时间来看,移民搬迁安置在经历试点阶段后,于1993—2009年期间正式实施;这期间根据三峡枢纽工程的建设分期情况主要开展了4期移民,移民安置逐渐由就近安置转向就近安置与外迁安置并重。因此,这3个省市的样本在揭示三峡库区移民发展情况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抽样方法为分层随机抽样。首先抽取了4个市(区),包括重庆市万州区和江津区、江西省宜春市和江苏省盐城市;然后在这4个市(区)中各随机抽取5~10个有代表性的乡镇,再对各乡镇所管辖的安置地进行调查。为获得问卷调研的真实情况,调研小组由具备调研经历和专业知识的调研人员带队,并对调研员开展了详细的培训;为克服受访者对调研员可能会存在的抵触和不信任等问题,在成员组成上优先选择了来自调研当地的调研员;同时在调研具体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受访者自填法、参与式观察法以及口头访谈法等获取一手资料和数据。此外,为获得更多更准确的移民家庭发展状况信息,重点访问了移民家庭的户主。期间,团队共发放问卷1207份。本文根据以下标准选择样本:①根据三峡库区移民搬迁的前后时间,删除不在1993—2009年期间搬迁的样本;②删除下文所选择变量为空白的样本。最终得到1170份样本,包括585个移民样本和585个非移民样本。

3.2 变量设置

3.2.1 被解释变量:志向水平

基于搬迁移民自身的特点和调研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并参考学者对志向水平变量设置的已有思路^[25,26],选择信心程度、韧性程度、风险态度以及乐观程度来系统刻画志向水平。在此基础上,使用熵值法拟合得到最终的志向水平。由熵值法计算得到的信心程度、韧性程度、风险态度以及乐观程度的权重依次为0.201、0.159、0.451和0.189。

3.2.2 主要解释变量:扶持政策

借鉴石智雷等^[21]和吕建兴等^[27]学者的研究思路,从财政补贴、就业培训、金融贷款、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治理7个方面表征扶持政策。同时将这些扶持政策进一步划分为资金补助型政策和环境改善型政策。其中,资金补助型政策是指财政提供的补贴救济,环境改善型政策主要从就业培训、金融信贷、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改善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进行度量^②。根据熵值法计算结果,扶持政策在就业培训、借贷难度、银行信贷服务质量、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医疗卫生条件评价、住房面积、住房质量、交通条件以及生态环境治理上的权重分别为0.477、0.192、0.025、0.030、0.155、0.024、0.028、0.038、0.017和0.014。

3.2.3 控制变量

参考既有文献^[28,29],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发展特征3个维度选取控制变量。其中,个体特征选取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社会融入程度变量。家庭特征主要选择家庭人口规模和家庭风险冲击变量。考虑到移民搬迁安置地分布较广,为控制区域之间发展差异,地区发展特征变量使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表征。相关变量的定义、赋值方式以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3.3 研究方法

考虑到扶持政策变量的类型,选用OLS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模型如下:

② 融信贷包括银行借贷难度和银行信贷服务质量评价,社会保障包括是否拥有养老保险、是否拥有医疗保险以及对本地医疗卫生设施条件的满意度评价,住房保障包括房屋面积和房屋质量评价。

2022年7月

表1 变量定义与赋值

Table 1 Definition and value assignment of the variables

变量类型	变量定义及赋值	非移民		移民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志向水平	由信心、韧性、乐观程度以及风险态度拟合得到的连续型数值	0.555	0.157	0.480	0.155
未来发展信心水平	非常低=1;比较低=2;一般=3;比较高=4;非常高=5	3.438	0.794	3.111	0.834
困境中恢复的可能性	完全不可能=1;不太可能=2;一般=3;比较可能=4;非常可能=5	3.465	0.758	3.256	0.806
未来生活乐观程度	非常不乐观=1;比较不乐观=2;一般=3;比较乐观=4;非常乐观=5	3.716	0.814	3.321	0.895
对冒险事情的态度	非常不喜欢=1;比较不喜欢=2;一般=3;比较喜欢=4;非常喜欢=5	2.821	0.931	2.542	0.845
资金补助型政策	对财政补贴救济的评价由低到高 1~5 赋值(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很满意=5)	3.015	0.849	2.150	1.014
环境改善型政策	由就业培训、金融贷款、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拟合得到的连续型数值	0.349	0.209	0.311	0.218
是否参与就业培训	参与就业培训=1;否则=0	1.108	0.310	1.152	0.359
银行借贷难度	能获得借贷=1;否则=0	0.535	0.499	0.354	0.479
银行服务质量评价	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很满意=5	3.265	0.758	2.944	0.926
房屋面积	实际套内面积/m ²	107.068	39.667	93.885	39.950
房屋质量满意度评价	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很满意=5	3.279	0.916	2.762	1.024
养老保险	有=1;否则=0	0.562	0.497	0.479	0.499
医疗保险	有=1;否则=0	0.897	0.304	0.867	0.340
医疗设施条件评价	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很满意=5	3.415	0.870	3.178	0.959
便利交通性评价	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很满意=5	3.680	0.873	3.643	0.899
生态环境满意度评价	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很满意=5	3.675	0.715	3.444	0.886
性别	男性=1;女性=0	0.426	0.495	0.388	0.488
年龄	实际年龄/岁	58.243	12.581	57.010	10.766
婚姻状况	已婚=1;其他=0	0.848	0.359	0.877	0.329
受教育程度	学前=0;小学=6;中学=9;高中及中专=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	7.304	3.698	6.754	3.670
收入水平	年收入等级由低到高 1~8 赋值([0, 5000)=1; [5000, 10000)=2; [10000, 30000)=3; [30000, 50000)=4; [50000, 100000)=5; [100000, 200000)=6; [200000, 500000)=7; 50 万以上=8)	2.590	1.426	2.407	1.315
社会融入程度	与本地人交往的频繁程度由低到高 1~5 赋值(几乎不往来=1;不经常联系=2;一般=3;隔三差五联系=4;经常联系=5)	4.417	0.866	3.699	1.259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成员数量/人	3.906	1.773	4.783	2.106
家庭风险冲击	近3年家庭发生过意外伤害等事件=1;否则=0	0.737	0.441	0.668	0.471
地区经济条件	当年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元,取对数	11.021	0.220	10.973	0.240

注:收入指标主要使用收入等级进行度量。这主要是由于收入问题在实际调研中是一个敏感性极高的话题,特别是在“藏富”心理干扰以及移民“抱怨”心理影响下,受访者对收入的回答往往与实际情况有偏差。在参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中收入等级划分的基础上,同时根据笔者所在团队历年对移民收入范围长期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将移民个人收入分为8个区间。*、**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下同。

$$AMB_i = \alpha + \beta MP_i + \gamma EP_i + \lambda C_i + u_i \quad (1)$$

式中: i 表示第 i 个受访者; AMB 表示志向水平; MP 表示资金补助型政策; EP 表示环境改善型政策; C 表示控制变量组,包括受访者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发展特征变量; α 为常数项; β 、 γ 和 λ

为各变量对应的系数; u 为随机扰动项。

在检验政府扶持政策对移民志向水平的影响后,本文借鉴Shorrocks等^[30]采用的方法进一步使用夏普利(Shapley)分解法分析扶持政策对移民志向水平的贡献度。

此外,借鉴经典文献^[31,32]的研究思路,使用 Oaxaca-Blinder 分解法进一步拓展分析扶持政策介入情境下移民与非移民志向水平的差异及其来源。移民(M)与非移民(N)的志向水平差异(ΔAMB)由禀赋效应和系数效应构成。其中,禀赋效应差异是由影响两群体志向水平结果变量的各个特征变量(X ,包括 MP 、 EP 以及 C)差异造成的,属于合理差异;系数效应差异为两群体各个特征变量的回报率差异,这种回报差异是个体禀赋所不能解释的,常被用来衡量身份歧视程度。

$$\Delta AMB = \underbrace{[E(X_M) - E(X_N)]\beta^*}_{\text{禀赋效应部分}} + \underbrace{[E(X_M)](\beta_M - \beta^*) + [E(X_N)](\beta_N - \beta^*)}_{\text{系数效应部分}} \quad (2)$$

式中: ΔAMB 为移民与非移民的志向水平差异; $E(X_M)$ 和 $E(X_N)$ 分别表示解释移民与非移民志向水平因素的特征均值; β_M 和 β_N 分别表示解释移民与非移民志向水平因素的系数; β^* 为使用全样本估计得到的非歧视系数。

4 结果与分析

4.1 扶持政策影响移民志向水平的估计结果

表2为政府扶持政策对移民志向水平影响的整体效应。考虑到横截面数据存在异方差的问题,在具体估计中使用了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列(1)和(2)为没有纳入控制变量时,资金补助型政策和环境改善型政策对移民志向水平影响的OLS估计结果;列(3)和(4)为纳入相关控制变量的OLS估计结

表2 扶持政策影响移民志向水平的估计结果

Table 2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influence of supportive policies on resettlers' aspiration level

变量	(1)	(2)	(3)	(4)	(5)
资金补助型政策	0.042*** (0.007)		0.033*** (0.007)		0.025*** (0.006)
环境改善型政策		0.223*** (0.031)		0.174*** (0.031)	0.145*** (0.030)
性别			-0.001 (0.013)	0.002 (0.013)	0.003 (0.013)
年龄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婚姻状况			-0.040** (0.019)	-0.051*** (0.019)	-0.042** (0.019)
受教育水平			0.004**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收入水平			0.018*** (0.005)	0.015*** (0.005)	0.014*** (0.005)
社会融入程度			0.026*** (0.005)	0.026*** (0.005)	0.023*** (0.005)
家庭人口规模			0.007** (0.003)	0.005* (0.003)	0.006* (0.003)
家庭风险冲击			0.018 (0.013)	0.024* (0.013)	0.020 (0.012)
地区经济水平			-0.013 (0.025)	0.024* (0.024)	-0.034 (0.024)
常数项	0.389*** (0.016)	0.411*** (0.011)	0.463* (0.275)	0.949*** (0.264)	0.702*** (0.271)
N	585	585	585	585	585
R^2	0.075	0.097	0.186	0.197	0.220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是稳健标准误,下同。

2022年7月

果;列(5)为重点关注的最终估计结果。由列(5)结果可知,在控制个体、家庭以及地区特征变量时,资金补助型政策 and 环境改善型政策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25和0.145,均通过1%的置信水平检验,表明两类政策均能显著提升移民志向水平,但环境改善型政策在提升移民扶志效应上的效果大于资金补助型政策。这与高博发等^[12]的研究结论较为相似,即直接的资金支持往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缺点在于难以提高搬迁户的内生动力;而技能培训、产业帮扶等扶持措施在提高搬迁户内生动力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从政策实施的角度来看,当政府想要通过扶持政策促进移民志向水平提高时,就必须意识到这两类政策的差异,同时更加高效解决移民发展志向不足时就需要充分发挥两类政策的协同优化作用。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社会融入程度等均可以提高移民志向水平。这一结论得到既有研究的有力支持: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能够增强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增强发展信心,而收入水平也是提高志向水平的现实基础和物质条件^[28];社会融入程度高的个体可以通过风险分担机制帮助其有效抵御风险冲击^[17],进而促使其对未来发展持有乐观心态。此外,年龄与婚姻状况会降低移民志向水平,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能力会发生变化,尤其在人生后期,个体能力相对减弱,对生活宿命感增强,导致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的动力降低^[33];已婚家庭往

往承担着更大的家庭责任和生活压力,从而抑制了追求更高生活目标的期望。但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家庭风险冲击以及地区经济水平对志向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女之间在个体能力与家庭分工等方面的差异有所减小,性别差异对志向水平的解释力相应降低;当前移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保护体系不断完善,抵御家庭风险冲击的能力得到增强,使得家庭风险冲击对发展志向的影响不明显;移民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搬迁安置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时,移民与原居民发展差距也有可能被放大,持续存在的发展差距会削弱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给个体发展志向带来的正影响。

4.2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基准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以下3种稳健性检验。首先调整估计样本,具体剔除年龄达到70岁以上的样本,同时对样本进行缩尾和截尾处理。其次改变指标权重赋值方式,重新使用变异系数法和等权重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再次改变估计方法,使用Probit和分位数回归进行估计。由表3中结果可知,重估后的扶持政策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整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表明基准估计结果可信。

4.3 不同安置方式与安置时长情境下扶持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4.3.1 不同安置方式下政策扶志效应的异质性

由表4中结果可知,在外迁安置移民和就近安

表3 稳健性估计结果

Table 3 Robust estimation results

变量	改变估计样本			改变权重		更换估计方法			
	≤70岁	缩尾	截尾	变异系数法	等权重法	Probit	q=0.1	q=0.5	q=0.9
资金补助型政策	0.028*** (0.007)	0.025*** (0.006)	0.024*** (0.006)	0.024*** (0.006)	0.024*** (0.006)	0.146*** (0.059)	0.027** (0.009)	0.027*** (0.009)	0.006 (0.014)
环境改善型政策	0.141*** (0.031)	0.141*** (0.029)	0.127*** (0.028)	0.199*** (0.037)	0.245*** (0.058)	0.954*** (0.283)	0.138*** (0.042)	0.174*** (0.037)	0.168** (0.07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21	585	559	585	585	585	585	585	585
R ² /Pseudo R ²	0.252	0.232	0.206	0.260	0.247	0.126	0.147	0.113	0.145

注:缩尾处理为1%和99%分位数缩尾,截尾处理方式同缩尾;Probit估计中的因变量是根据熵值法拟合后的志向水平均值来设置,将高于均值的志向水平赋值为1,将小于等于均值的志向水平赋值为0。

表4 扶持政策扶志效应的异质性

Table 4 Heterogeneity of the aspiration effect of supportive policies

变量	外迁安置	就近安置	短期安置	长期安置
资金补助型政策	0.014* (0.008)	0.031*** (0.010)	0.029*** (0.009)	0.021** (0.010)
环境改善型政策	0.236*** (0.050)	0.083** (0.037)	0.113*** (0.035)	0.191*** (0.05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i>N</i>	274	311	333	252
<i>R</i> ²	0.224	0.274	0.271	0.225

注:为进一步检验安置方式的分组差异,引入安置方式与扶持政策的交互项,结果也表明扶持政策的扶志效应在不同安置方式上存在显著组间差异;对安置时长采取相同的检验方法也得到类似的结论。

置移民中,资金补助型政策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4和0.031,分别通过10%和1%的置信水平检验,且资金补助型政策对外迁安置移民的影响系数小于对就近安置移民的影响系数,表明资金补助型政策对就近安置移民扶志效应的提升更大。相比之下,环境改善型政策对外迁安置移民和就近安置移民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36和0.083,分别通过1%和5%的置信水平的检验,因而环境改善型政策对外迁安置移民的影响更大。

4.3.2 政策扶志效应的动态异质性

为进一步考察政府扶持政策的影响随时间推移的发展趋势,根据移民安置时长的均值将安置移民分为短期安置(小于等于均值)移民与长期安置(大于均值)移民进行对比分析。由表4结果看出,资金补助政策对短期安置移民的影响系数略高于对长期安置移民的影响系数,而环境改善型政策对长期安置移民的影响系数略高于对短期安置移民的影响系数。因而,资金补助型政策对短期安置移民影响显著更大,而环境改善型政策对长期安置移民影响显著更大。也即,随着搬迁安置时间的推移,资金补助型政策的扶志效应减弱,而环境改善型政策的扶志效应增强。

4.4 不同扶持政策的贡献度差异分解

4.4.1 不同扶持政策对移民扶志效应的贡献度测算

根据上述基于 R^2 的夏普利分解研究方法步骤,分别求得了各类扶持政策的贡献率,结果见表5。资金补助型政策和环境改善型政策对移民扶志效应的贡献率分别为13.01%和50.01%,前者贡献率低

表5 基于夏普利分解的不同扶持政策贡献率

Table 5 Contribution rates of different supportive policies based on Shapley's decomposition

变量	夏普利值	百分比/%
资金补助	0.036	13.01
就业培训	0.040	14.68
住房保障	0.037	13.42
医疗保障	0.021	7.76
金融信贷	0.032	11.63
交通设施	0.003	1.09
环境治理	0.004	1.43
其他	0.102	36.98

于后者37%。这表明,与直接的资金补助相比,通过改善移民发展环境进而提升移民的扶志水平能够产生更大效果。由此可见,研究假说H1得到验证。

进一步分析各类扶持政策的具体贡献率后发现,影响移民志向水平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为就业培训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其贡献率分别达到14.68%和13.42%。首先,移民搬迁后过去积累的生产经验基本在安置地失灵,移民为继续获得财富,就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生产生活以适应安置地环境的变化。移民恢复发展期间政府通过各种的就业培训、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业改善和提升了移民相应的技能,为恢复和重建移民生产生活提供了保障,进而对提升移民发展信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移民虽然获得安置房,但也存在一些移民所居住的安置房质量较差问题,不仅为修缮房屋需要不断增加额外消费,还严重影响了移民生活的幸福度、满意度和舒适度,

2022年7月

削弱了移民发展志向。

应当指出的是,交通设施以及环境治理扶持政策对移民志向水平的贡献率不足2%,远低于其他扶持政策的贡献率。其中,交通基础设施贡献率较低的可能原因有:一方面,移民安置地交通基础设施日渐改善,其他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也加快发展,甚至会对移民安置地产生虹吸效应,导致安置区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拉大,移民的发展信心进而被削弱。另一方面,移民利用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个体自我发展的能力还不足。比如,移民在交通基础设施欠发达环境中所形成的生产习惯和生产经验在新发展环境中需要一个适应和调整期,因而交通基础设施对移民带来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而生态环境贡献率较低的原因可解释为:移民搬迁安置前大都处于生态环境较为优越的区域,尽管近年来政府对安置地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大,但相比搬迁安置前的生态环境仍存在不少差距,这种落差会导致移民的失落情绪;部分移民甚至迫于生计压力,表现出破坏环境的行为^[34],移民与生态环境共生关系并不稳固。

4.4.2 安置方式与安置时长情景下政策扶持贡献率的异质性分析

表6为安置方式与安置时长情景下政策扶持贡献率的异质性。在外迁安置移民样本中,资金补助型政策与环境改善政策对移民扶志效应的贡献率分别为7.03%和50.87%;而在就近安置移民中这两类政策的贡献率分别为11.82%和49.71%。由此可

见,资金补助型政策对就近安置移民的扶志效应更大,而环境改善型政策对外迁移民的扶志效应更大,这佐证了研究假说H2。从安置时长来看,资金补助对短期安置移民的扶志效应贡献率为16.65%,对长期安置移民的扶志效应为7.07%。相比之下,环境改善型政策对短期安置移民的贡献率为43.36%,对长期安置移民的贡献率为57.61%。由此可见,即使考虑到不同安置时期,环境改善型政策对移民扶志效应的贡献率也要高于财政资金补助政策,而且随着搬迁安置时间的延长,环境改善型政策的贡献率增加,而财政资金补助政策的贡献率减少。因而,研究假说H3成立。

4.5 拓展分析:扶持政策下移民与非移民的扶志效应的差异

表7为政府政策扶持下移民与非移民扶志效应差异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具体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分解情境是剔除扶持政策变量下的结果,第二个分解情境是纳入扶持政策变量的结果。由剔除扶持政策变量下的分解结果可知,禀赋效应值系数和系数效应值系数分别为0.030和0.045,两者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移民与非移民在志向水平上的差异由禀赋效应差异和系数效应差异两个部分组成。其中,禀赋效应占总效应的40%,系数效应占60%,不可解释的系数效应占比更大,这说明不考虑扶持政策时移民与非移民志向水平差异中移民身份歧视因素影响较大。由考虑扶持政策变量下的分解结果可知,禀赋效应和系数效

表6 不同安置情景下扶持政策的贡献率

Table 6 Contribution rates of supportive policies under different resettlement scenarios

变量	外迁移民		就近移民		短期移民		长期移民	
	夏普利值	百分比/%	夏普利值	百分比/%	夏普利值	百分比/%	夏普利值	百分比/%
资金补助	0.018	7.03	0.043	11.82	0.053	16.65	0.019	7.07
就业培训	0.060	23.41	0.028	7.68	0.040	12.63	0.038	13.89
住房保障	0.014	5.42	0.060	16.60	0.031	9.61	0.050	18.29
医疗保障	0.017	6.45	0.052	14.25	0.034	10.59	0.017	6.42
金融信贷	0.035	13.52	0.030	8.34	0.027	8.37	0.043	16.00
交通设施	0.001	0.41	0.007	2.06	0.002	0.77	0.005	1.78
环境治理	0.004	1.66	0.003	0.78	0.004	1.39	0.003	1.23
其他	0.108	42.10	0.139	38.47	0.128	40.00	0.096	35.32

表7 移民与非移民扶志效应差异分解

Table 7 Decomposition of aspiration between resettlers and non-resettlers

变量	不考虑扶持政策		考虑扶持政策	
	系数	$P > Z$	系数	$P > Z$
非移民	0.555	0.000	0.555	0.000
移民	0.480	0.000	0.480	0.000
差值	0.075	0.000	0.075	0.000
禀赋效应	0.030	0.000	0.066	0.000
系数效应	0.045	0.000	0.009	0.460

应的估计值分别为0.066和0.009,但系数效应的估计值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考虑扶持政策变量时,两群体间的志向水平差异不再归因于身份歧视;而且,禀赋效应的估计值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可见在考虑扶持政策变量时移民与非移民在扶志效应上的差异主要源于两群体在禀赋上的合理差异。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结论

本文基于提升移民内生发展能力的视角分析了扶持政策的扶志效应,并利用三峡库区水电工程移民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LS、Shapley和Oaxaca-Blinder分解法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1)扶持政策整体上对提升移民志向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经过调整估计样本、改变指标权重以及更换估计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可信。从两类政策扶志效应的大小来看,环境改善型政策的扶志效应大于资金补助型政策,前者对提升志向水平的贡献率大致高于后者37%;就业培训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在环境改善型扶持政策的贡献率中占比较大。

(2)扶持政策的扶志效应在不同安置方式和安置时长情境下具有异质性。与外迁安置移民相比,资金补助型政策对提升就近安置移民志向水平的作用更大;与就近安置移民相比,环境改善型政策对提升外迁安置移民志向水平的作用更大;搬迁安置时间越长,资金补助型政策的扶志效应越弱,而环境改善型政策的扶志效应越强。

(3)移民与非移民在志向水平上的差异由禀赋效应差异和系数效应差异两个部分组成。不考虑扶持政策时,移民与非移民志向水平差异中禀赋效

应占比小于系数效应占比,说明移民身份歧视因素对两群体间的志向水平差异影响更大;在扶持政策介入下移民发展志向水平仍低于非移民,但移民与非移民间的志向水平差异主要源于两者禀赋上的合理差异。

5.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1)要把扶持政策作为提升移民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抓手。一是要继续完善资金补助型政策,如在移民非物质或比较隐性的生产生活资料损失上加快制定相应的补偿标准,同时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状况探索实行补助资金的动态调整,并整合各类项目建设基金和专项资金向移民安置区有序倾斜。二是针对部分没有发挥出扶志作用的环境改善型政策,要进一步加强对移民群体的政策宣传,并做好政策实施的评价和监测,充分利用扶持政策帮助移民树立发展致富的意志与信心。

(2)从移民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出发搭配使用不同类型扶持政策,对政策扶持方式以及扶持方向也要进行相应动态调整。如随着搬迁安置时间的推移,移民发展越来越依靠外部环境的改善,对资金依赖减弱,此时需要进一步强化环境改善型扶持政策,通过扶持安置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信贷服务、社会保障等措施为移民发展创造更加优质的外部环境,并克服从政策实施到移民受益过程中的各种阻碍因素。

(3)从缩小移民与非移民群体间的志向差距上来看,要改变过去单纯基于移民自身搬迁前后发展志向的变化来评估移民搬迁效果,相关部门需要根据搬迁安置方式和搬迁时长建立新的社会比较机制并适时调整,关注移民与非移民的志向水平的相对差距问题,避免政策扶持过程中可能会拉大移民与非移民发展差距的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檀学文. 中国移民扶贫70年变迁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8): 2-19. [Tan X W. The evolv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resettled people in 70 year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9, (8): 2-19.]
- [2] 程军, 陈绍军, 陈宇航. 开发性移民再定义及其中国实践模式

2022年7月

- [J]. 水力发电, 2018, 44(11): 6-9. [Cheng J, Chen S J, Chen Y H. Redefinition of development-oriented resettlement and its practice patterns in China[J]. Water Power, 2018, 44(11): 6-9.]
- [3] Ray D. Aspirations, Poverty and Economic Chang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4] 李文静, 帅传敏, 帅钰, 等. 三峡库区移民贫困致因的精准识别与减贫路径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6): 136-144. [Li W J, Shuai C M, Shuai Y, et al.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overty identific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paths of immigrant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g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6): 136-144.]
- [5] 杨秀君. 抱负水平研究的进展[J]. 心理科学, 2001, (4): 497-498. [Yang X J. Progress in ambition level research[J].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1, (4): 497-498.]
- [6] 尤亮, 霍学喜. 渴望: 概念、抱负水平研究的进展形成机理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0, 42(1): 140-152. [You L, Huo X X. Aspirations: Concept,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rospects[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20, 42(1): 140-152.]
- [7] 方长荣. 世界银行非自愿移民政策与我国水库移民政策的比较分析[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2): 92-94. [Fang C 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orld Bank's involuntary migration policy and China's reservoir migration policy[J]. Journal of He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2, (2): 92-94.]
- [8] 宋海朋. 水库移民与建设征地农民补偿安置政策比较研究[J]. 人民长江, 2018, 49(8): 103-106. [Song H P. Comparison of compensation policy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 and land-expropriated farmer due to construction[J]. Yangtze River, 2018, 49(8): 103-106.]
- [9] 孙良顺.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演进过程与扶贫取向[J]. 求索, 2019, (3): 97-103. [Sun L S. Evolution process and poverty relief orientation of the later support policies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J]. Seeker, 2019, (3): 97-103.]
- [10] 杜春林, 程莉祺. 从强制性到诱致性: 水库移民政策演进与创新路径[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6): 73-81. [Du C L, Cheng L Q. From compulsion to inducement: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path of reservoir migration policy: A case study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 policy in Hunan Province[J].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1, 22(6): 73-81.]
- [11] 陈绍军, 缙杰, 田鹏.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非预期后果及其转向[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24(3): 77-82. [Chen S J, Gou J, Tian P.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nd changes of the late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reservoir resettlement[J]. 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2, 24(3): 77-82.]
- [12] 高博发, 李聪, 李树茁.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 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J]. 经济地理, 2022, 42(4): 168-177. [Gao B F, Li C, Li S Z.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y,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livelihood risks of anti-poverty relocated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Shaanxi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4): 168-177.]
- [13] 孙良顺.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执行偏差及其优化: 基于关系视角的讨论[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6(3): 110-115. [Sun L S.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late-stage supporting policy of the reservoir mi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36(3): 110-115.]
- [14] Cernea M. The risks and reconstruction model for resettling displaced populations[J]. World Development, 1997, 25(10): 1567-1589.
- [15] 滕祥河, 杨先明. 非自愿搬迁经历与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 兼论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交互效应[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1, 20(2): 238-248. [Teng X H, Yang X M.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and resettlers' relatively multidimensional asset pover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nsidering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support[J].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1, 20(2): 238-248.]
- [16] 朱永甜,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陕南三市1680份农户数据[J]. 资源科学, 2021, 43(10): 2013-2025. [Zhu Y T, Yu J.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farmers' income and income gap: A case study of 1680 households in Southern Shaanxi[J].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10): 2013-2025.]
- [17] 管睿, 余劲. 外部冲击、社会网络与移民搬迁农户的适应性[J]. 资源科学, 2020, 42(12): 2382-2392. [Guan R, Yu J. External shocks, social networks and adaptability of resettled farming households[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12): 2382-2392.]
- [18] 唐贵忠, 左萍, 赵焕娥. 水利水电工程征地移民的恋旧与补偿心理分析[J]. 人民黄河, 2005, (4): 45-47. [Tang G Z, Zuo P, Zhao H 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n nostalgia and compensation of land requisition immigrants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J]. Yellow River, 2005, (4): 45-47.]
- [19] 黄志刚, 陈晓楠, 李健瑜. 生态移民政策对农户收入影响机理研究: 基于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J]. 资源科学, 2018, 40(2): 439-451. [Huang Z G, Chen X N, Li J Y. 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policy 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ith formative indicators[J]. Resources Science, 2018, 40(2): 439-451.]
- [20] Souksavath B, Nakayama M.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velihood of resettlers from the Nam Theun 2 Hydropower Project in Lao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2013, 29(1): 71-86.
- [21] 石智雷, 朱明宝. 正式社会支持对非自愿移民经济发展效应分

- 析[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3, 33(11): 62-72. [Shi Z L, Zhu M B. Effects of formal social suppor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voluntary immigrant[J]. 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3, 33(11): 62-72.]
- [22] 张会萍, 石铭婷.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 基于宁夏“十三五”不同安置方式的女性移民调查[J]. 宁夏社会科学, 2021, (3): 163-178. [Zhang H P, Shi M T. A study on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female migra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inhospitable areas: On the female migration survey of different resettlement modes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 Ningxia[J]. Ningxia Social Sciences, 2021, (3): 163-178.]
- [23] 赵旭, 肖佳奇, 段跃芳. 外迁安置、土地流转及水库移民生计转型[J]. 资源科学, 2018, 40(10): 1954-1965. [Zhao X, Xiao J Q, Duan Y F. Relocation, farmland transfer and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J]. Resources Science, 2018, 40(10): 1954-1965.]
- [24] Wilmsen B. After the delug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settlement at the Three Gorges Dam,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6, 84 (8): 41-54.
- [25] 张志胜.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 基于精神扶贫视[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 (3): 72-81. [Zhang Z S. Abse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peasants' subjectivity in the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ces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J]. Journal of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8, 18(3): 72-81.]
- [26] 周强, 赵清云, 王爱君. 志智双扶: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努力程度的影响[J]. 财贸研究, 2021, 32(12): 37-49. [Zhou Q, Zhao Q Y, Wang A J. Will-wisdom poverty alleviation: Impa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on rural residents' efforts[J].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2021, 32(12): 37-49.]
- [27] 吕建兴, 曾小溪, 汪三贵. 扶持政策、社会融入与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返乡意愿: 基于5省10县530户易地扶贫搬迁的证据[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3): 29-40. [Lu J X, Zeng X X, Wang S G. Supportive policy, social integration and willingness of returning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530 households in ten counties of five provinces[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19(3): 29-40.]
- [28] 包智明, 焦开山. 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的脱贫信心及其相关因素研究[J]. 民族研究, 2020, (3): 28-41. [Bao Z M, Jiao K S. A study on the confide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mong ethnic minority poor groups and related factors[J].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20, (3): 28-41.]
- [29] 郎亮明, 张彤, 陆迁. 农业科技扶贫的多维效应: 增收、扶智与扶志[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 (9): 129-144. [Lang L M, Zhang T, Lu Q. Multi-dimensional effec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income and will-wisdom[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1, (9): 129-144.]
- [30] Shorrocks A F. Decomposition procedures for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A unified framework based on the Shapley value[J].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13, 11(1): 99-126.
- [31] Oaxaca R. Male and 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73, 14 (3): 693-709.
- [32] Blinder A S. Wage discrimination: Reduced form and structural estimate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73, 8 (4): 436-455.
- [33] 解垚, 李敏.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J]. 中国人口科学, 2022, (1): 99-112. [Xie E, Li M. The aspiration support effect of government public transfer payment[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22, (1): 99-112.]
- [34] 李楠, 石智雷, 杨雨萱, 等. 贫困地区的环境保护: 库区居民的环保意识与行为[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 (7): 129-139. [Li N, Shi Z L, Yang Y X, et 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poor area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the reservoir area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8, (7): 129-139.]

Aspiration inspir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supportive policies 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settler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TENG Xianghe, WEN Chuanhao

(School of Economic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Effectively stimulating the level of resettler' aspir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l motivation for self-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resettlement survey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in 2019,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level of aspiration inspired by supportive policies and explored the heterogeneity of aspiration under different resettlement scenarios with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Shapley, and Oaxaca-Blinder decomposition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cash compensation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esettlers' aspirations, but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olicy is greater than cash compensation policy. The supporting effect of cash compensation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olicy is different due to the different resettlement mode and resettlement duration. Cash compensation policy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improving the aspiration level of nearby resettled population, while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olicy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improving the aspiration level of interprovincial resettlers.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of resettlement, the supporting effect of cash compensation policy weakens, while the suppor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olicy increases. When supporting policy is not taken into account, the difference of aspiration level between resettlers and non-resettlers is mainly due to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resettler identity. The development aspiration level of resettlers is still lower than non-resettlers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supportive policies, but the difference in aspiration level is mainly due to the reasonable difference in resource endowments of the two group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our research results include taking supportive policy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esettlers' development aspirations, using different types of supportive policies according to resettlers' characteristics and adjusting them dynamically when necessary, and narrowing the aspirations gaps between resettlers and non-resettlers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support provision.

Key words: resettler; supportive policies; inspired aspiration; cash compensation policy;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olicy; Shapley decomposition; Oaxaca-Blinder decompositio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